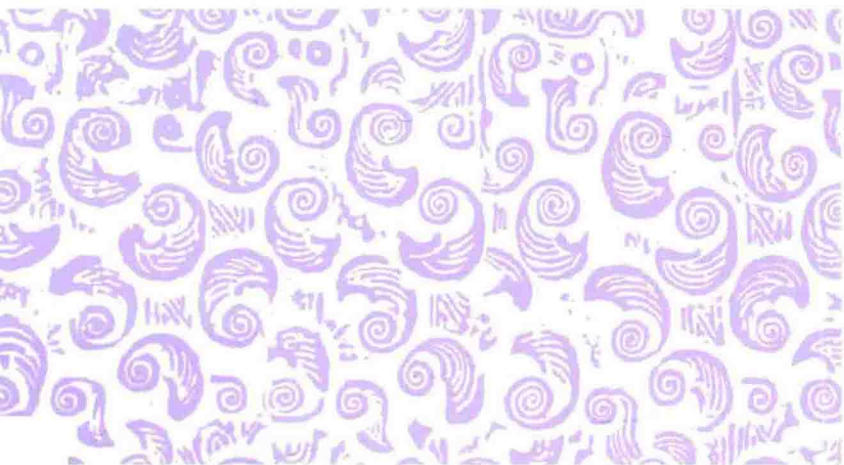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国语》研究

张鹤 著



《国语》研究

张鹤 著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国语》研究/张鹤著. —北京:
学苑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345 - 6

I. ①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春秋时代 - 史籍
②《国语》- 研究 IV. ①K225. 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4323 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 book001. 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@ public. bta. net. cn](mailto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)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邮购)

印 刷 厂: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00 元

本书出版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校级一般个人项目(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)(12YBG028)的资助

序

《国语》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。《国语》记事，上自周穆王，下迄鲁悼公，其终结与《左传》时代相近，而其体例与《左传》不合，其成书时代，也大体与《左传》相仿佛，或者略晚于《左传》。《国语》一书的作者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”，而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云：“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，又纂异同为《国语》。”类似的说法亦见于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所引班彪之言，则左丘明作《国语》，也应该是有所根据的。《春秋》以鲁为内，以诸国为外，因而《国语》可以称为《春秋外传》。班固《汉书·韦贤传》、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、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、刘知幾《史通·六家》均持此观点，认为《国语》为“《六经》之流，《三传》之亚也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皆列《国语》在经部春秋类中，但《四库全书》将《国语》划入《史部·杂史类》，这说明在清代以后，《国语》渐被忽视。

近年来，学术界对《国语》的研究虽有充分的重视，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著作还略嫌不足。

张鹤博士好学深思，曾以《国语》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张鹤又数易其稿，完成了这部专著，即将由学苑出版社付梓，嘱我作序。我忝为张鹤博士在读博士期间的指导教师，自然是十分乐意的。

张鹤博士的这本书共有六章十九节。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为《国语》的成书研究,辨析了《国语》作者、版本与注本问题中的难点与疑点。其余各章分别就《国语》的内容、思想、文体、文学成就等展开深入、细致的论析,从而揭示了《国语》所兼有的历史、文学、经学、政教的多重性质。

本书见解新颖、深刻,创获颇多。比如《国语》的作者问题历来是《国语》研究的难点,本书作者不落窠臼,另辟蹊径,认为《国语》的作者应是一个系统,这其中包括有《国语》的作者、编者和传诵者。

《国语》的成书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:《国语》中的文章首先由作者写作、记录,在其流传过程中瞽、矇等传诵者对其进行讲诵、增饰,最后由编者对这些文章进行选择、编辑,遂成今本《国语》一书。《国语》的作者和编者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史官,《国语》的传诵者则是担任讲史任务的瞽、矇。又如本书第四章着力考察“语”体渊源,进而对《国语》文体做出界定:“语”、“言”在周代都为乐语,是周代的诗教形式,具有政教功能;《国语》是关于王道观念和事件的记录;和《左传》单纯的记事不同,《国语》在“史”的品格以外,还具有“左史记言”的咨政意义,显现出其源自周代诗教的政教本质。与先秦诸“语”相比,《国语》规模最大,内容最丰富,体例最完善,是先秦“语”之集大成者。这些观点,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此外,本书还通过对《国语》内容的辨析和思想的研究,证明了《国语》为《春秋外传》的合理性。并将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从内容、风格、写作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,这些见解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张鹤博士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,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

教学与研究工作的，相信以张鹤博士的勤奋好学和孜孜不倦，假以时日，必在国学研究领域做出重要成绩。希望她能再接再厉，不断有更高质量的新著嘉惠学林。

方 铭

2013年4月30日于北京

摘 要

《国语》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,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。《国语》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《语》,共21卷,243篇,总计7.3万余字。《国语》记录了春秋时期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文化等诸方面内容,保存了不少先秦时期的历史传说、政治制度和宗教祭祀方面的材料。一定程度上,《国语》可看作是一部先秦历史,特别是春秋史的百科全书。《国语》资料来源复杂,八《语》思想内容各有特点,故《国语》研究不应拘泥于文体学条框。本书利用传统考据和历史文献学的方法,逐一考察《国语》的成书、内容、思想、文体、文学成就等问题,从而揭示《国语》所兼有的历史、文学、经学、政教的多重性质。

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为《国语》的成书研究。

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,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梳理,辨析《国语》作者、版本与注本问题中的难点与疑点。第一章通过对先秦史官职守的转变和瞽矇讲史的辨析认为,《国语》的作者应是一个系统,这其中包括有《国语》的作者、编者和传诵者。《国语》的成书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:《国语》中的文章首先由作者写作、记录,在其流传过程中,瞽矇等传诵者对其进行讲诵、增饰,最后由编者对这些文章进行选择、编辑,遂成今本《国语》一书。《国语》的作者和编者应该是西周春秋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史官,《国语》的传诵者则是由瞽矇担任的讲史。第二章通过考察《国语》版本流变情况和《国语》各时代注本特点,彰显其文献学价值。

第三章通过对《国语》内容的辨析和思想的研究,证明了《国语》为《春秋外传》的合理性。

从内容上看,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都记载春秋时期的史事,两书在内容上互补互证,并且《周语》中西周末年的史实和其他各《语》的许多记载弥补了《左传》内容的不足。从思想上看,《国语》中的天人观、兴亡观、民本观、君主观和礼乐观,弘扬德的精神,尊崇礼的规范,起到了崇善抑恶,辅助理解《春秋》经义与传文的作用。

第四章着力考察“语”体渊源,进而对《国语》文体做出界定:“语”、“言”在周代都为乐语,是周代的诗教形式,具有政教功能。

《国语》是关于王道观念和事件的记录。和《左传》单纯的记事不同,《国语》在“史”的品格以外,还具有“左史记言”的咨政意义,显现出其源自周代诗教的政教本质。并且与先秦诸“语”相比,《国语》规模最大,内容最丰富,体例最完善,是先秦“语”之集大成者。

第五章从语言运用、谋篇布局、人物形象、情节结构、风格特征五个方面,论述了《国语》的文学成就。

《国语》语言平易,文风流畅,全书不乏精彩的人物对话、出色的外交辞令、严密的说理散文。《国语》编纂意图十分明确,谋篇布局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。《国语》运用集锦法、对比法、丛见法塑造了国君、谋臣、小人物、女性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《国语》记录了早期散文的发展轨迹,展现了春秋各国文风的差异。由上可见,《国语》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。

第六章将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。

一、内容比较:从规模上看,《国语》记事时间广,《左传》叙事力度深。从所载史实看,二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文字有大量相同之处,但所载历史事件的重合部分又有时间、人物、经过、引用文献等方面的差异。从所记史料看,作为“经”的《左传》在历代

的注释和整编过程中难免会失去原有的文辞和形式。而《国语》因为较少受到关注,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它的原貌,从而汇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材料。

二、风格比较:《左传》全书语言风格统一,《国语》则比较复杂,全书既有共性,又有个性。《左传》字斟句酌刻意求工,《国语》则各篇水平参差不齐,各《语》风格颇有差异。

三、写作特点比较:《国语》重在记言,《左传》详于叙事。《国语》善于集锦法塑造人物形象,《左传》长于多角度叙述事件。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分别代表了先秦时期“语”体作品与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。

绪 论

一、《国语》研究意义

《国语》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,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。“《国语》是‘以国分类’,‘以语为主’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国别史。”^①它记载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(前976)征犬戎,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(前453)韩、赵、魏联合灭智伯的524年历史。全书共21卷,243篇,总计7.3万余字,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《语》,即《周语》三篇,《鲁语》两篇,《齐语》一篇,《晋语》九篇,《郑语》一篇,《楚语》两篇,《吴语》一篇,《越语》两篇。《周语》详记周王室历史,从周穆王开始至周敬王为止。《晋语》从晋武公开始至晋哀公为止,内容几占全书1/2。《鲁语》从鲁庄公齐、鲁长勺之战开始,终于鲁哀公。《齐语》专记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之事,其史料与《管子·小匡》相同而略有增删。《郑语》只记郑桓公规划立国之事。《楚语》从楚庄王开始,终于楚惠王时白公胜之乱。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记吴王夫差与越王句践争霸之事。

《国语》开创的国别史体例便于以某国的事件和人物为主要记述对象,且由于其有背景的联系,并无与整个时代割裂之感。这种体例后来多用于分封割据时的历史记载。后世模仿《国语》的史书不少,最著名的便是刘向整理成书的《战国策》。此外陈寿的《三国

^① 周予同:《中国历史文选》上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版,30页。

志》、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、崔鸿的《十六国春秋》、吴任臣的《十国春秋》，都是《国语》体例的发展。此外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的“世家”、《东观汉记》和《晋书》中的“载记”也显然是受到《国语》的影响，梁启超就曾指出《史记》“其世家、列传，既宗雅记，亦采琐语，则《国语》之遗规也”。^①

三国吴韦昭在《国语解叙》中说：“（左丘明）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迄鲁悼智伯之诛，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，阴阳律吕，天时人事逆顺之数，以为《国语》。”^②《国语》通过记载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之语论述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，探讨国家兴衰治乱之根源。全书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，弘扬德的精神，尊崇礼的规范，为当时的君臣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借鉴，是我们研究和了解先秦社会史、思想史的宝贵资料。

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、财政、军事、兵法、外交、教育、法律、婚姻等诸方面内容，保存了不少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、天象节令、生活习俗、民谚歌谣和神话传说，这些材料与《左传》相比更具有原创性，其中言及上古、三代之历史史料，多为他书所未见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

《国语》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，全篇以记言为主，兼以记事，在语言运用、人物塑造、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由其所确立的宾主问答的对话体方式推动了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。《国语》是一部未曾加工整理的原始史料汇编，保留了西周春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风貌，堪称研究西周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历

①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15页。

② （春秋）左丘明撰：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：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。本书所引《国语》原文和韦昭注解均依据此版本，为了论述方便，文中一并采用此本各卷篇章标题。

史散文的活标本。

然而,一直以来《国语》的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:《国语》通常以研究过程中辅助材料的身份出现,它的价值被仅仅定位于参考层面。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一方面《国语》中的材料被无数的论著零星引用,而另一方面专门的研究文章非常少见的奇怪现象。

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的密切关系在客观上削弱了《国语》作为重要文献的独立性。《国语》之研究,古来皆附属于《左传》之后,而且多为注释、今译,或单篇零散之作,几乎没有对其文体、思想、历史内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。文学史家在论述先秦历史散文的时候,通常是以《左传》上承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,而将《国语》放在《左传》之后论述,且普遍认为《国语》艺术成就不及《左传》。^①这种看似公允的定位,掩盖了《国语》的真实价值,使《国语》失去了在先秦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。其实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成书于同时甚至稍前,二书具有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的关系,实可互为参验。近年来,学术界对《国语》的研究得到了加强,其中也涉及对《国语》文学、思想等方面的研究,但除了一些分量不大的论文外,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。

基于这种认识和研究现状,笔者希望通过对《国语》一书成书、内容、思想、文体、文学成就等全方位的研究,重新审视《国语》在历史、文学、经学、政教各层面的价值,进而更好地辨析《国语》与《左

^① 推崇《左传》贬抑《国语》古已有之: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引李焘语,以为《国语》“其辞多枝叶,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,甚者驳杂不类,如出他手”。崔述《洙泗考信录·余录》说:“《左传》之文,年月井井,事多实录。而《国语》荒唐诬妄,自相矛盾者甚多。《左传》纪事简洁,措辞也多体要;而《国语》文词枝蔓,冗弱无骨。”

传》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联的关系。

二、《国语》研究综述

(一)《国语》的作者

汉代学者普遍认为《国语》的作者是左丘明,最早的记载见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《太史公自序》云:

昔西伯拘姜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^①

这段文字又见于他的《报任少卿书》中:

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,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及如左丘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,退论书策以舒其愤,思垂空文以自见。^②

① (汉)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一百三十,中华书局,1982年版,3300页。

② (汉)司马迁:《报任少卿书》,(清)严可均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《全汉文》卷二十六,中华书局,1958年版,271页。

根据司马迁的说法,《国语》的作者是一位叫左丘明的人,关于左丘明,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中还有记载:

是以孔子明王道,干七十馀君,莫能用,故西观周室,论史记旧闻,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,上记隐,下至哀之获麟,约其辞文,去其烦重,以制义法,王道备,人事浹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,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其真,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,成《左氏春秋》。^①

可知,左丘明是一位鲁国的君子,他不但著有一部《国语》,而且在孔子死后,由于害怕孔门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又根据孔子的史记写成了一部《左氏春秋》。

在司马迁之后,班彪也提到:

定、哀之间,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,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,又撰异同,号曰《国语》,二十一篇。^②

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亦云:

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,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,又纂异同为《国语》。^③

① (汉)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十四,中华书局,1982年版,509-510页。

② (南朝宋)范晔: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卷四十,中华书局,1973年版,1325页。

③ (汉)班固:《汉书》卷六十二,中华书局,1962年版,2737页。

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：

《左氏传》三十卷。左丘明，鲁太史。

《国语》二十一篇。左丘明著。^①

班氏父子与司马迁的不同处在于明言《国语》成于《左传》之后，左丘明的身份也由鲁君子变成了鲁太史，并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提到他大约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，曾与孔子一同观史：

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徵之矣。”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。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^②

王充在《论衡》中也说道：

《国语》，《左氏》之外传也，左氏传经，辞语尚略，故复

① 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三十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，1714页。

② 同上书卷三十，1715页。

选录《国语》之辞以实。然则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世儒之实书也。^①

由上述记载可知，汉代学者对于《国语》作者是左丘明这个说法，并无异议。此后学者如吴韦昭，晋孔晁，唐刘知幾，宋司马光、晁公武、李焘、朱熹，明王世贞，清纪昀，近人章太炎，今人钱穆、童书业、金德建，瑞典人高本汉等大都持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观点，《国语》作者为左丘明遂成为一种普遍观点。

由于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两书风格、体裁、思想、内容都有差别，因此汉代以后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书不可能为一人所著，对《国语》作者为左丘明提出怀疑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：

1. 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非一人所作

傅玄、刘炫等虽然对《国语》作者为左丘明提出异议，但他们出言比较谨慎，没有提出新的作者。

晋傅玄：《国语》非丘明所作，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，必《国语》虚，而《左传》实。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！

隋刘炫：《国语》非丘明作。

唐赵匡：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文体不伦，序事又多乖刺，定非一人所为也。^②

宋陈振孙：自班固《志》言左丘明所著，至今与《春秋传》并行，号为《外传》。今考二书虽相出入，而事辞或多

①（汉）王充：《论衡》卷二十九，四部丛刊初编子部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版，273页。

②（唐）陆淳：《春秋集传纂例》卷一，“赵氏损益义”引。